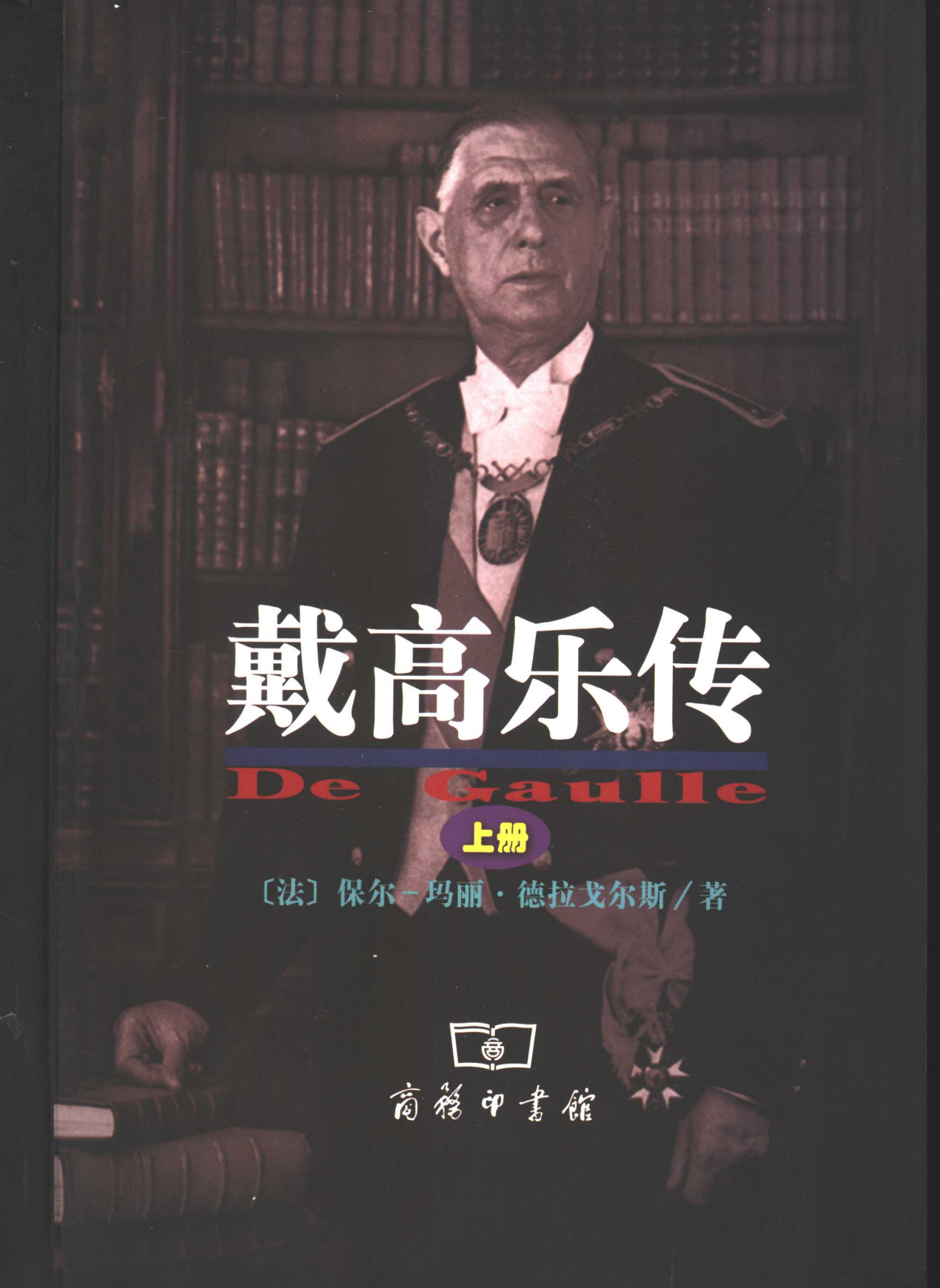


A portrait of Charles de Gaulle, the French general and statesman, standing in a library. He is wearing a dark military-style jacket with epaulettes and a large circular medal on a chain around his neck. His hands are resting on a stack of books in the foreground. The background is filled with bookshelves containing numerous books.

戴高乐传

De Gaulle

上册

〔法〕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 / 著



商务印书馆

戴 高 乐 传

上 册

〔法〕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 著

曹松豪 译

商 務 中 書 館

2006 年 · 北京

戴高乐是 20 世纪的历史伟人

——《戴高乐传》中译本序言之一

戴高乐将军与世长辞已经快 35 年了,但时至今日,他那无与伦比的个性和人生却继续引起人们的关注。究其原因,也许是戴高乐代表着一些时至今日遭到忽视的价值,而当代法国人往往对这些价值遭到忽视引以为憾。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的著作《戴高乐传》以一种叹为观止的简明扼要的笔触,叙述了戴高乐将军的一生——从他在里尔度过的青少年时代,一直写到他在科隆贝双教堂镇故居的逝世。德拉戈尔斯避开那些由历来靠不住的心理分析造成的障碍,陈述了一些经过验证的和可以加以验证的史实,而这些史实会使我们理解那些使夏尔·戴高乐成为 20 世纪历史伟人之一的重要决定的由来和意义。

1940 年 7 月 22 日,我在伦敦同戴高乐将军第一次相见。由于当时不能接受贝当(元帅)政府签订法德停战协议这种可耻的投降行径,我决定到伦敦去投奔戴高乐,而此时,由于热爱法兰西和具有对祖国的责任感,戴高乐开始进行了抵抗斗争,这样就使他遭到了贝当政府的降职处分和缺席判处死刑。然而,在我看来,戴高乐是惟一能使法兰西免遭奇耻大辱的依靠。事实上,凡是认为独立和自由是不能屈从于任何妥协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戴高乐身上。1940 年,在一切都似乎使德国纳粹当局和那些向德国纳粹效忠的法奸——据戴高乐的用语,这些人“擅离战斗岗位”——感到称心如意之时,必须具

有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反对贝当政府的政策,经得起屈辱和诬陷,并在缺乏真正的军事手段的情况下开展斗争。戴高乐并不缺少这种品格,他特别具有一种强烈的和坚定的荣誉感,这不仅是个人的荣誉感,而且是祖国的荣誉感。

戴高乐坚韧不拔地追求他自己确定的目标,从而使他逐步地获得了大多数法国人的赞成。想当年,虽然不是所有这些法国人都参加了军事行动,但是,随着对纳粹德国的胜利成为可能,至少他们都与戴高乐心心相印。戴高乐本来只能成为一位杰出的军事战略家,但他却善于成为一位国务活动家。因为他很早就懂得,仅仅从纳粹德国的占领中解放法兰西是不够的,还必须确保法兰西应在自由国家之林中享有全部权利的地位。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戴高乐开始表示反对美国的计划——但这绝不是对美国计划怀有敌意。他坚定不移地恢复了法兰西民族政府的权威,从而避免在本土上建立一个要使法兰西接受战胜国占领和管理的“敌占区盟国军政府”。

解放法兰西,确保法兰西的政治和军事独立,使法兰西拥有民主政体和现代经济,这就是戴高乐将军业已在国内实现的伟业。

戴高乐在总统选举中引进普选制,以及实施公民投票,无疑是在民主方面获得成功的最突出的范例。人们可以把这种范例看成是戴高乐个人专权的偏向,有些人——他们并不总是心地善良的——经常批评这种专权偏向,但他们却忽视了戴高乐身上一个令人尊敬的、至今还赢得人们赞赏的性格特点,这就是原则同行动保持一致。戴高乐尊重民主,每当大多数法国人做出一项与其信念相反的决定时,他就退出了政坛。德拉戈尔斯详细地描述了戴高乐在所有这些紧要关头,都让个人的政治雄心服从个人的荣誉感和正直感。这也是他看人的标准。

无疑,假如戴高乐的行动只限于法国和法语国家的范畴,那他就

不会在众多国家的人民中间产生深刻的影响。诚然,戴高乐是法国核威慑力量、协和式飞机和欧洲航天事业的创始人。但是,他特别是对法兰西帝国实行非殖民化的实践者。对此,只有了解戴高乐忠于各国人民都拥有不可让与的自决权这一信念,才能理解他的非殖民化政策。

1944 年 1 月 30 日,戴高乐将军发表了布拉柴维尔讲话,开辟了未来发展的道路。他在这篇讲话中声明说:“如果非洲人不是在自己的国土上,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利用进步,如果他们不能逐渐地提高到能在本国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水平,那就毫无真正的进步可言。法兰西的义务则是,致力于(非洲)实现真正的进步。”1958 年,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进行就新宪法公投的宣传运动时,非洲已经实现了戴高乐的这种意志。那些对新宪法投“赞成”票的海外领地,被承认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共同体内部享有自决权;那些投“反对”票的海外领地,则马上赢得了独立。1959 年,当我担任西非总督时,戴高乐来塞内加尔参加了非洲和马达加斯加共同体的最后一次会议。他使那些没有提出独立要求的国家获得了独立,并私下对我说:“殖民主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前途,即使在苏联也是如此。”

阿尔及利亚和越南获得独立的进程,比非洲的独立进程更加悲惨,但戴高乐的指导路线却依然不变:要让那些不愿再接受法国托管的国家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前途。我深感,是尊重诺言和忠于自己发表的观点,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好地培养了戴高乐这位超群拔俗的国务活动家。由于这个缘故,整个法兰西的重要地位都得到了提高。然而,有时要有足够的时间,才能使人们理解和接受戴高乐所采取的立场。1940 年 6 月 18 日,他在伦敦发表广播讲话时是这样;1966 年,法国撤出北约军事组织也是这样;1964 年 1 月 27 日,法兰西共和国在不利于西方盟友、特别是不利于美国的情况下同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时也还是这样,而美国只是在 15 年后才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纵观戴高乐的一生,他毫不退让地实行了历史传承下来的原则,同时也经常走到了时代的前面。戴高乐高瞻远瞩,才经常超越时代的偶然性,这方面的证据不胜枚举。作为其中的一个证据,我只想援引德拉戈尔斯在《戴高乐传》第 34 章最后引证过的、他在 1964 年 1 月 31 日记者招待会上就法中两国新关系发表的讲话中的这段精彩语录:“在世界发生的巨变中,尤其是有可能发生这样的变化:首先,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为人类的事业服务,即为智慧、进步与和平的事业服务;其次,各国人民的交往会继续减少那种现在开始发生的和导致世界发生分裂的、各阵营之间的悲剧性对比和严重对立;最后,世界各地的人们会早一点举行会晤,参加 175 年前法兰西向世界提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约会。”戴高乐说得好,他捍卫的价值不仅是法兰西一国的价值,而且是全世界的共同价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德拉戈尔斯所著的《戴高乐传》必将开卷有益,有助于丰富中国读者的思考。

法兰西共和国前政府总理

法兰西研究院院长

皮埃尔·梅斯梅尔

2005 年 5 月写于巴黎

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戴高乐

——《戴高乐传》中译本序言之二

在所有的戴高乐传记作家中间，惟独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先生同戴高乐将军有过直接的接触。1964年，德拉戈尔斯出版了他的前一部著作《在两个世界之间的戴高乐》，此书出版前，他曾同戴高乐进行过会见和密谈，聆听过戴高乐的长篇谈话。

此后35年，德拉戈尔斯于1999年出版了一部堪称全传的戴高乐传记，其法文版长达近1500页。

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戴高乐传。书中叙述和分析了戴高乐将军一生所经历的所有的事件，以及他进行的所有的斗争。作者始终看到，他是在描述一位在法兰西历史和当代世界历史中都占有首要的一席之地的非凡人物。因此，人们不能把戴高乐说成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国务活动家。德拉戈尔斯则善于找到一种正确的尺度——把握好描述传主的传奇生涯和严格尊重历史事实之间的尺度。

※

※ ※

法国人民没有忘记，戴高乐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他关于民族独立的思想和要求基础之上的。他们没有忘记，戴高乐于1964年1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 戴高乐传

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戴高乐，正如中国文化年和法国文化年先后在法国和中国举行，以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希拉克先后在巴黎和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所证明的那样。

现在是出版德拉戈尔斯先生所著的《戴高乐传》中译本的时候了。

谨向我们的中国朋友致谢。

前自由法兰西战士

戴高乐将军的前部长

法国宪法委员会前主席

夏尔·戴高乐基金会主席

伊夫·盖纳

2004年10月写于巴黎

永久的敬仰

——《戴高乐传》中译本序言之三

夏尔·戴高乐将军是20世纪在全世界最负盛名的领导人之一。

上个世纪40年代,当希特勒法西斯的轰炸机和坦克军团横扫西欧,法兰西共和国陷于山河破碎、分崩离析之际,他毅然肩负起维护国家独立与尊严的重担,发出鼓舞人们奋起抗争的呼唤,吹响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号角。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时,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称赞他是“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独立的不屈战士”。

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敢于冲破西方冷战政策的樊篱,率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他是一位敢于反潮流的有胆有识的领导人,当两个超级大国以君临天下之势,到处发号施令之时,戴高乐总统同毛泽东主席一样,坚定地捍卫国家主权,维护民族的自尊,公然藐视并坚决抗衡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古往今来,世界政治舞台上过客匆匆,或如朗月明星,或如沉舟落叶;或百代流芳,或遗臭人世。功过臧否,最终要由人民作出裁判。

只有那些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为国家民族的尊严和解放一往无前的人,能够赢得人民永久的敬仰。

曹松豪同志热心于向中国读者推介法国文化,已有多部译著问世,其中有当代法国的总统传记《希拉克传》、《密特朗传》,此次又将最新版本的戴高乐将军传记翻译出版,作为一名从事对外联络的公

8 戴高乐传

务人员,他的勤勉和敬业精神是令人钦佩的,他为中法文化交流所作出的努力是有价值的。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 奎 元

2004 年 12 月 18 日写于北京

不屈的战士 伟大的丰碑

——《戴高乐传》中译本序言之四

今年是中法建交 40 周年，中法友好合作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值此法国文化年之际，商务印书馆即将隆重推出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兼新闻记者保尔—玛丽·德拉戈尔斯所著的《戴高乐传》中译本，无疑是一件促进中法政治文化交流的盛事。

戴高乐将军是 20 世纪的一位法国和世界伟人，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德拉戈尔斯的新著《戴高乐传》则以最新的史料，重新描述了戴高乐 80 年波澜壮阔的人生，是一部迄今为止达到最高学术水平的戴传，对我们全面深刻地了解和研究戴高乐将军的人生、思想及法国的内外政策来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读《戴高乐传》，首先使我深切地怀念戴高乐将军，想到了 40 年前在巴黎开始外交生涯，同传主戴高乐直接进行接触的一段经历。我在 1964 年至 1969 年期间，曾担任过中国首任驻法国大使黄镇同志的秘书和翻译，随同黄大使参加过一些由戴高乐总统邀请和主持的外事活动。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体会，戴高乐高瞻远瞩，在捍卫法兰西民族独立、反对美苏霸权、决定中法建交和发展中法友好合作关系问题上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历史已经证明，戴高乐总统当年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一道建立中法正式外交关系，对今天发展中法友谊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0 戴高乐传

读《戴高乐传》，也使我深情地思念法国友人，想到了作者德拉戈尔斯这位相识 20 多年的老友。纵观作者的职业生涯，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他担任过《国防》杂志社社长、《费加罗报》评论员等职，担任过梅斯梅尔总理、新闻部长盖纳、内政部长富歇等政要的顾问或办公室主任，在法国政界和新闻界具有重要的地位。其二，他治学严谨，勤奋笔耕，著作颇丰，在研究法国现代历史、内外政策和国家战略问题上独树一帜。其观点和著述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性；既脚踏实地，又卓有远见，因而是严肃的、可靠的和值得借鉴的。其三，他对华友好，从 70 年代至今已五次访华。此次，他以 76 岁的高龄来参加法国文化年开幕和“戴高乐生平展”活动，我十分高兴同他在北京重逢，深感他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也分享了他对中国翻译出版其巨著的无比喜悦。

读《戴高乐传》，还使我想到了中译者曹松豪同志。松豪同志长期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当我 90 年代担任驻法国大使时，他也曾在驻巴黎使馆工作过。他敬业乐群，勤奋工作，是一位善于坚持调研和自修相结合的外事干部兼法文翻译家。例如，他翻译的《希拉克传》在希拉克 1995 年 5 月当选总统前夕出版，曾得到过希拉克总统亲笔题词的殊荣。此次，他在中法互办文化年之际又成功地翻译了德拉戈尔斯的《戴高乐传》。这里，谨对松豪同志为中法两国文化交流辛勤劳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祝贺。

2004 年实现了中法两国国家元首的年内互访，在中法两国的友谊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特别是胡锦涛主席今年 1 月访法，为戴高乐基金会写下的“伟人风范长存 中法友谊常青”的题词，充分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缅怀和敬仰戴高乐将军的心声。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和中国法兰西研究会会长，衷心地祝

愿德拉戈尔斯先生的《戴高乐传》中译本在广大中国读者中取得预期的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驻法国大使
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法兰西研究会会长

蔡 方 柏

2004 年 11 月写于北京

中译本引言

本书是拙著《戴高乐传》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和译者曹松豪先生希望出版这个中译本。对此，我向他们表示无限感激，也感到非常自豪。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中国对这位法兰西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抱有如此浓厚的兴趣，这表明，戴高乐的言行影响到世界各国，我的祖国也由于戴高乐而备受世界各国的关注。

作为作家、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我的大部分人生和工作都用于撰写戴高乐和戴高乐时代的历史。早在1964年，我就出版过一本长达765页的关于戴高乐的法文著作。但我一直认为，必须重写此书，并写完此书，一直写到戴高乐生命的终止。因为当时，戴高乐的原始材料很少，既没有任何大学的或学术上的研究成果，也没有任何完整的对第五共和国前期的历史记载，而且也接触不到任何历史档案，几乎只有一些罕见的传记人物梗概和很少的一些证词。我的写作只能依靠当时所能有的下述手段：回忆录、报刊杂志、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现有的传记、谈话记录，其中包括戴高乐同我的谈话——本书将会引述这些谈话——记录，以及戴高乐业已发表的著作。不仅如此，我还使用了自己撰写的、关于戴高乐亲身经历过的那些事件的证词，以及我参与过的那些事件的证词，尽管我的参与是那样微不足道。

时至今日，情况完全不同了。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和俄国，

所有的历史档案都开放了,尽管尚有某些限制。戴高乐也撰写了《希望回忆录》,可惜没有完成。关于戴高乐及其活动的证词,首先来自所有的法国前总理、他的许多部长、合作者、支持者和政敌,多得不可胜数。我在出版过的一些著作中,曾提到过戴高乐公共生活的好几个事件。夏尔·戴高乐研究所和夏尔·戴高乐基金会都出版过关于戴高乐生平及其著作等许多方面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戴高乐诞辰10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则对于这一历史阶段的研究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我试图利用这一切材料。但此次写作,我却不能获得戴高乐本人的帮助了——假如我能再次同戴高乐进行交谈,那他还会亲自向我提供帮助。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那样,我是在1964年完成第一部关于戴高乐的著作时,同他见过面的。虽然我们没有作出任何商定,但那时我不想引证他的话。而今,我在本书中引述了戴高乐的谈话,它们将会阐明下述问题:法国在被德国占领时期进行的抵抗斗争;法国共产党在法国解放时的行为;1945年戴高乐所作的经济政策的选择;战后法国奉行的对德政策;阿尔及利亚(在一次比1964年更早的谈话中也曾提及过);关于1962年普选共和国总统的全民投票;60年代初戴高乐对世界的看法等。同戴高乐的这些谈话至少有这样的价值:我没有对他提出过任何要求,他对我也没有任何期待,因此这些谈话是完全自由的。我认为,我书中如实援引的这些证词是值得公诸于世的。

本书的读者是否会觉得这是一本带有党派偏见的戴高乐传记呢?假如我在这里必须向读者进行解释的话,那我是毫不为难的。戴高乐作为法兰西历史的中心人物长达30年之久,在这段历史中任何人都不会是中立的。我也与其他任何人一样。我经常赞同戴高乐的所作所为,有时还参与其中。我也曾表达过自己的观点,例如,我

表示过支持非殖民化。就像人们将要在本书中读到的那样,我讨论了戴高乐活动的几个问题。总之,那不成问题。我已在其他场合说过,并经常写道:传记的客观性不是一种绝对要求,而是一种努力的目标。我进行过这种努力。我在努力时并没有感到需要抑制自己的情感,而且归根结底没有太大的困难。对此,职业生涯是我最好的学校。对我来说,如实地看待问题和进行报道已经成为我的另一种天性,即使(或者特别是)在我因此而感到伤心、怨恨、受到伤害和满腔愤怒时也是如此。我仍然遵循着同样的准则:我的分析不应被我的偏爱所歪曲。

我在人生暮年出版这本戴高乐传记,来追溯 20 世纪的疯狂行为、两次世界大战、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曾经全身心地参加过的战斗、法兰西帝国的垮台、意识形态的死亡、被超越的矛盾、被忘却的争吵……凡此种种,戴高乐都参与了。戴高乐必须应对那些突如其来的灾难、可悲的决裂和震撼世界的动荡。作为一个梦想其亲爱的祖国获得未来胜利的赤子,戴高乐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喜悦,尽管他在俘虏营里被囚禁过。因为戴高乐为了法国军队的彻底现代化进行过坚决的斗争——大家承认,实现这种现代化,就会使法国避免失败——因为人们没有倾听戴高乐的意见,所以法国在 1940 年才突然遭到了溃败。

40 年代,多亏战友们的情感和法国人民的支持,戴高乐凭借其意志的力量,使法国保持在战胜国的行列之中。戴高乐出身于欧洲最古老的资产阶级,但他却呼吁法国人民举行反对(德国)敌人和屈从于它的(维希)政权的全国起义。戴高乐出身于一个开明的和温和的家庭,但他却下令进行严厉的清洗,打击了一部分法国的传统权贵。作为宣读过青年士官生誓言的圣西尔军校毕业生,戴高乐被迫呼吁法国军队归顺自由法兰西和进行造反。作为将军,戴高

乐制服了由阿尔及利亚悲剧引发的军人叛乱，并使他们的将领受到了审判。

50年代，戴高乐为了在法国建立比以前的政权更加适应现代国家要求的国家体制而进行斗争。起先，戴高乐没有获得成功；后来，他在成立第五共和国时达到了目的。然而，60年代初，戴高乐相信法国的世界作用，所以他像20世纪精神所要求的那样，不惜在阿尔及利亚进行较量，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来赋予所有的法属非洲国家以独立。在这十年里，戴高乐领导了对法国工农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加速的和有时显得粗暴的改造，还领导了法国经济边界的开放。戴高乐想要以壮观的方式，来埋葬古老的法德冲突。戴高乐同冷战精神实行了决裂，对集团制度进行了否定和斗争。1964年戴高乐同人民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就是在集团制度中打开了一个缺口，使人民中国很快在国际大家庭里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戴高乐看到那些威胁着“东方阵营”的裂缝，预言东方阵营将要奄奄一息，并预示东方阵营未来的分裂。

20世纪也是一个意识形态激烈对抗的世纪。戴高乐参加了这一对抗，人们从他在伦敦和阿尔及利亚发表的讲话中，找到了反对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极权主义制度斗争的某些最强音。但是，在同时代人进行的关于世界观的重大争论中，戴高乐却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戴高乐首先相信民族的永恒，相信意识形态的不稳定性。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在20世纪看到了征服者意识形态的暂时胜利，或者至少看到了这些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共产主义曾风靡一时，蔚为壮观。自由主义则提供了另一种前景的观念，它拥有单一的市场、被取消的边界、民主政体和所谓“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的全球联盟。

而今，在意识形态的公墓中，坟墓的大门关上了。戴高乐曾经用